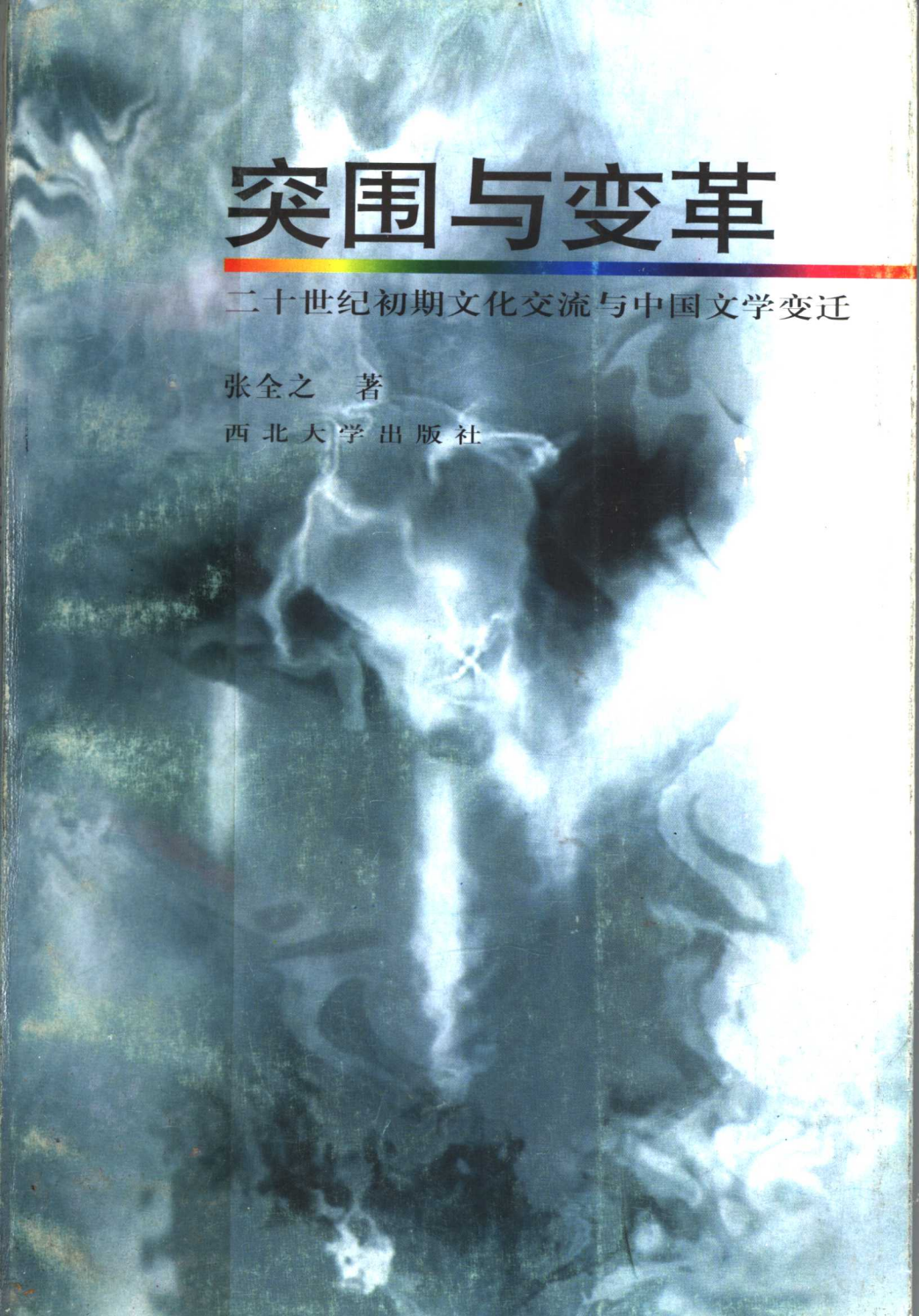




突围与变革

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

张全之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TUWEI YU BIANGE

突围与变革

——二十世纪初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

张全之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萍

封面设计 王 祚

突围与变革

张全之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5印张 213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604-1239-4/I·174 定价:14.00元

序

李新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20 世纪毫无疑问是史无前例的。一百年风风雨雨，一百年跌宕起伏，一百年鲜血与烈火！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不断觉醒又不断陷入困惑、不断遭受苦难又不断艰难前行！这一百年的文学浸透着这一切。

站在 20 世纪最后的时刻回顾这整个世纪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在痛苦的思索和艰难的探寻中踏着泥泞和血污，抚着流血的伤口进入 20 世纪的。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几千年的光荣回忆终于再也无法抵挡现实的耻辱，中国人失去了骄傲和自豪的梦乡，割地赔款的事实使历来自认为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中国终于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复杂而非单一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永远难以忘记的耻辱，因为它把一个民族从温柔富贵的美梦拖进了腥风血雨。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它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使中华民族很不情愿地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奔波，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由于很不情愿，由于对话缺乏平等的基础，这种交流有一个过程。开始，只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向别人学习的，然而，在坚船利炮面前却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于是，有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运动。然而，当时的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社会整体结构中，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大要素需要相互适应，保持平衡和谐。在一个已经形成的稳定结构中，只引进一种因素不但难以改变其社会性质，而且引进的要素由于进入

不同的结构，还会呈现不同的功能。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尊重历史的事实而承认洋务运动的成就，正是它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建立起了相当强大的北洋水师。然而，发展、繁荣和强大却往往也有虚假，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体西用设想的破产。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新的觉悟：为什么拥有坚船利炮之后仍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清醒的知识分子想到了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的官僚体制必须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肩负民族的命运而高高地站立起来，然而，变法维新的运动却以谭嗣同等人的鲜血宣告了它的失败。

中国人就这样面对民族的危机和变革者的鲜血进入了20世纪。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起点！它意味着20世纪一开始就是在痛苦中寻找出路的行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起点，中外文化开始大面积交流融汇，冲突也全面展开。从世纪之交到1917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这短短的17年的时间，是20世纪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时期。因为痛苦的寻找，历史的苦难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新的巨人，提供了新的天才，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型期，一切都在改变。时代制造着自己的英雄，我们似乎又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1911年革命的成功和成功之处都对民族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动荡的时代造就着自己的英雄，造就着自己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王国维……面对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个闪耀着灿烂光辉的痛苦的灵魂。它照耀着这个时期的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体现着这个民族在世纪初期的思索和寻找。

正因为这样，世纪初的文学具有了特殊的研究价值。应该说，不了解世纪初的文学，就不能正确理解五四新文学，不了解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理解此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在世纪初的群星中，几乎已经包含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问题和矛盾。

只有深入理解世纪初的群星，才能正确理解这个世纪。

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这却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和至今让人模糊不清的原因，在我们的视野里，世纪初的人们却往往成了一个影子，甚至在大学课堂上也成了被冷落被遗忘的地带，——讲授古代文学把它作为一个简略的尾巴，讲授现代文学又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之所以如此，大概主要由于历史观方面的原因，我们往往习惯于在历史发展不可切断的流中寻找某些新的因素，并以此为里程碑划分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我们致力于“新”的寻找时又往往由于见解的偏颇而导致视野的狭隘，这使中国新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幸免局限。进入 80 年代中期，我们终于认识到世纪初的价值，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钱理群、陈平原诸君提出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应该说功不可没，然而，实际的研究却仍然缺少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全之这本书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本书是魏绍馨先生主持的国家教委项目“中外文化交流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从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流变成为本书显著的特点。作者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汇这一大的背景，在对文学现象的考察上，更多地考察其在文化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展示了这个转型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对文学创作的考察上，没有沿袭对作品进行思想与艺术分析的传统写法，而是紧扣文化交流这一命题，分析作品在文化上的价值构成，试图描述出中国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后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同时，在评述中国作家受外来文化影响时，作者也没有简单地描述文化交流的形态，而是注重分析作家的心理因素，既看到有意识选择的动机，也指出无意识拒斥的潜意识所包含的文化动因，这就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作家在文化撞击中的心路历程。

本书以世纪初文学所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与文学艺术独立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为线索，详细考察中国文学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变迁。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正是历史的灾难逼使梁启超等人在富国强兵和变法维新的梦想破灭之后，才把主要精力放到思想文化上来，从而关心文学的启蒙与变革。这种出发点必然地使文学负载着沉重的启蒙救国的使命。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受着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同样受着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王国维们却表现出了不同的选择。梁启超等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不仅受到作家职业化的挑战，也受到王国维等的批判。这种矛盾甚至表现在鲁迅的身上，他意识到文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但在实际的文学活动中，他仍然认同文学启蒙救国这一大的文学母题。辛亥革命后，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泛滥，标志着文学意识挣脱了社会功利主义观念的束缚，然而，它的价值却是自身的病态发展。这事实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作者面对这一系列的矛盾所进行的分析，对于当前的文学发展也是不乏启示意义的。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任何现象，任何人物，在文明发展的历史上都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横空出世，而只能是发展的历史链中的一环。本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因此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对作家精神状态的分析过程中就比较清楚地显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必然联系和渊源关系。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在本书的映照之下就不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过程。比如鲁迅的启蒙思想，放在梁启超等人面前，在比较中就更容易定位和定性。这种方法也许并不新鲜，但文学史的研究如果忽视这种历史的联系，就会坐井观天般地做出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而这种论断在当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正大量存在着。

当然，任何学术成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于一个年轻

的、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更不应该抱太多的奢望。张全之这本书有着明显的急就章痕迹，的确留下了不少遗憾。我想，如果时间更从容，如果对世纪初几颗巨星从思想和心理上有更深入的理解，如果对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文化的命运从整体上有更本质的把握，如果作者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精神立场而且毫不犹豫，这本书会更有分量。我寄希望于未来，因为张全之还很年轻，因为他勤奋、有探索精神、追求独创而不愿人云亦云，因为他有现代知识分子所最宝贵的良知和使命感。

1997 年 4 月于曲阜师大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启蒙命题的确立.....	(1)
一、时代动荡与文学沉浮.....	(1)
二、“小说界革命”：在艺术与启蒙之间的艰难求索.....	(8)
三、“文界革命”：在高雅与通俗之间的艰难选择	(14)
四、“诗界革命”：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	(20)
第二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	(25)
一、文学东渐：林纾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25)
(一) 林纾与近代翻译的兴起.....	(25)
(二) 林纾的翻译活动.....	(27)
二、哲学东渐：严复的哲学选择与文学追求	(32)
(一) 启蒙主义思想的起点.....	(32)
(二) 来自西方的醒世哲学.....	(35)
(三) 东方古国的觉世文学.....	(40)
三、从意译到直译：周氏兄弟与晚清译界的意译风气	(43)
第三章 文学启蒙命题面临的挑战	(49)
一、从救国到媚俗：近代稿费制对文学的冲击	(49)
二、现代批评的新景观：王国维的文学批评	(56)
(一) 小说批评的现代性.....	(56)
(二) “美”——一种新的批评原则	(58)
(三) “境界”说的新内涵	(62)
三、借鉴与革新：鲁迅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继承 与超越	(65)
(一) 从“新民”到“立人”	(65)
(二) 从“民的发现”到“人的觉醒”	(68)

第四章 文化冲突与小说观念的演进	(74)
一、初试锋芒的反孔批儒运动	(74)
二、对西洋文学的接受与误读	(78)
三、小说理论(上):从“正史之根”到“自由”发 展	(83)
四、小说理论(下):创作问题的初步探询	(87)
第五章 “革命文学”的初步尝试	(93)
一、革命派的小说理论	(93)
二、革命派的小说创作	(97)
三、南社:革命派的诗歌创作	(109)
第六章 言情小说:《红楼梦》与《茶花女》的拼贴	(115)
一、鸳鸯蝴蝶派文学概观	(115)
二、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病态产儿	(120)
三、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地位	(123)
第七章 谴责小说:西洋镜下的中国官场	(128)
一、谴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28)
二、人物形象的文化类别	(132)
三、传统思想内容的近代性转换	(145)
四、中西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	(150)
五、价值观念的混乱与小说创作的局限	(157)
第八章 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在中国的赝品	(161)
一、对侦探小说功利性的挖掘	(161)
二、对侦探小说文体的认识	(165)
三、中国侦探小说创作	(168)
第九章 女性文学的萌芽及初步发展	(173)
一、革命女性的文学创作	(174)
二、文学对女性问题的反映	(179)
第十章 文明戏:从食洋不化到取悦世俗的艺术变异	(195)

一、从旧戏改良到话剧的诞生·····	(195)
二、从写意到写实：话剧艺术的艰难发展·····	(201)
三、“甲寅中兴”与文明戏的衰落·····	(205)
第十一章 主要创作现象分析·····	(208)
一、“乌托邦”小说的泛滥及其成因·····	(208)
二、影射：弥漫文坛的创作风气·····	(221)
三、重故事轻人物：小说艺术的盲点·····	(228)
第十二章 主要创作方法分析·····	(235)
一、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初步认识·····	(235)
二、现实主义在创作中的主要表现·····	(248)
后记·····	(256)

第一章 文学启蒙命题的确立

一、时代动荡与文学沉浮

历史的发展常常会挫伤人们的感情，也会无情地将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强暴加以颠倒。当人们说“历史是公正的”时候，就已指出了它曾有的不公正和人们心中无奈的祈祷。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屈辱，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但历史的尘沙并没有将血泪掩埋。直到今天，对于灾难的记忆仍像噩梦一样萦绕在炎黄子孙的窗前。也许真正的灾难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民族所付出的代价与所受的屈辱，而在于在那场历史性的较量中，我们除了正义之外，一无所有。从世界发展格局来看，鸦片战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向腐朽的封建王国发动的进攻。残酷的历史向中华民族发出了严正的忠告——要么放弃生存的权利，要么改变自己去顺应世界的潮流。迷恋于性灵、神韵的中国士大夫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他们只好整一整长袍马褂，拖着长长的辫子，去面对“西装革履”的“蛮夷”。打开国门，他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尚“茹毛饮血”、未经教化的“蛮夷”，已经武装到牙齿，正准备将我们蚕食鲸吞。残酷的现实逼使一向威加四海、傲视全球的天朝帝国低下高贵的头颅，进行沉痛的思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对灾难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走向历史的前台，主动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被称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也同知识分子一起，在烈火与鲜血中经受考验。

中国知识分子在设计最初的救国方案时，并没有把文学考虑

在内。魏源（1794～1857）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中的“长技”主要是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屈辱来自于战场上的失败，而在战争的较量中，最醒目的对比，就是武器——洋枪洋炮与大刀长矛相比其优劣是一目了然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如此醒目的军备差异，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西方在工业技术方面已远远超过我们；但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优越感，不会一下子消失，在承认自己科学技术落后的同时，依然在精神领域里为自己的自尊留下了一块阵地——他们固执地认为精神文化层面上东方优于西方。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中的“中学”是指东方的精神文化，而“西学”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冯桂芬声称：“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②这一看法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层面，因此这时期在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文学明显被忽视。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学仍旧踩着古老的节奏在历史的轨道上徘徊，没有能够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鸦片战争爆发初期，曾一度出现了以姚燮、张际亮、林则徐、鲁一同等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诗潮。诗人们感时忧国，用传统的诗歌形式，讴歌抗敌的爱国将士和人民群众，揭露侵略者的暴行，讽刺清王朝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现实主义作品。“三元里人民抗英”这一震动中外的事件发生后，诗人张维屏（1780～1859）创作了纪实性诗歌《三元里》，形象生动地对这一壮举进行了描写和歌颂：

^① 魏源：《〈海国图志〉叙》，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6月第1版，第12页。

^② 冯桂芬：《采西学议》，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第105～106页。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全诗以朴素的语言，宏观地展示了三元里人民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在艺术手法上，通过对声（听觉）、色（视觉）的渲染，形象地绘出了惊天动地的历史场景。但这些诗人，除林则徐外，都缺少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爱国诗派的出现虽然为没落的旧体诗注入了一点生机，却没有能够为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的旧体诗找到新的出路。

在小说创作方面，这一时期，充斥文坛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狎邪小说”，如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俞达的《青楼梦》等，这类作品大多都“摹绘柔情、敷陈艳迹”^①，“遂复不能摆脱旧套”^②；第二种是武侠公案小说，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及署名贪梦道人的《彭公案》、无名氏的《施公案》等，这类作品“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③，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由此可见，文学的发展也像封建王朝的命运一样，陷入历史的泥淖之中，面对如此沉闷的文坛，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鸦片战争前夜的龚自珍，是他以先觉者的姿态，开启了近代文学的大门。

龚自珍（1792～1841）是近代文学的先行者和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奠基人。龚自珍生活在民族危亡的前夜，清王朝用屠刀和枷锁维持的“康乾盛世”已锈迹斑斑，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高度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263页；以下所引，均为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56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69页。

集中和官场的严重腐败，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就在这时，西方新兴的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了古老的东方。灾难与危机像天边滚动的乌云，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但麻木衰朽的清朝帝国依然笼罩在貌似歌舞升平的假象之中，龚自珍以敏锐的触觉感到了灾难的降临。在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情况下，他以浪漫瑰丽的文字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在文学上，他的诗文以灵动活泼的形式及慷慨灼人的激情使走向末世的封建文学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在思想上，他以犀利的文笔抨击时弊，讽刺士人蝇营狗苟、丧尽廉耻的奴才嘴脸，并以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封建末世腐朽衰败的凄凉图景：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教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愉，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①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②

他对时弊的揭露是为了挽救末世王朝的崩溃和灭亡，但当权者的昏庸腐败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又使他痛心疾首。先觉者总是孤独的，他那杜鹃啼血般的惊世危言，在社会上毫无反响，当权者

① 龚自珍：《明良论》，《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8页；以下所引，均为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② 龚自珍：《尊隐》，《尊隐——龚自珍集》第2页。

依然醉生梦死，他只好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鼙声，夜之漫漫，鹳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① 我们不能把他说的“山中之民”机械地等同于稍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因为龚自珍还看不到被压迫阶级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也不可能意识到下层人民的反抗力量，但他对“山中之民”的呼唤，显示了龚自珍对当朝统治者的彻底绝望和对新的有生力量的朦胧期待。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龚自珍借《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表达了强烈的变法要求：“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劬改革，孰若自改革”^②，这无疑成为维新变法的先声。梁启超后来评价说：“龚自珍……讥切时政，诋诽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③ 但龚自珍毕竟是本土文化孕育的产儿，他只能从古代典籍中去寻找变易的依据，他的变法主张也不可能具有使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实际内容，与后来的康梁相比，他明显缺少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可以说，龚自珍的思想中尽管不乏近代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但长期封建文化的熏陶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使他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启蒙观念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在军备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我方将士虽浴血奋战，仍然全军覆没。严酷的事实证明，西学之“用”，难以挽救中学之“体”。退一步讲，即使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也无法改变末世王朝灭亡的命运。西方一位哲人指出，战争从来不会摧毁任何一个国家，它只能给垂

① 龚自珍：《尊隐》，《尊隐——龚自珍集》第4页。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尊隐——龚自珍集》第23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卷“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54页。

死的国家最后一击。衰老的封建肌体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一样，已经失去了再生能力，只要稍有点“伤风感冒”就会一命归天，更何况遭受如此巨大的考验呢？洋务派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继之而起的是维新派。维新派一开始就批判了洋务派急功近利、不得要领的救国方案，他们戏称“中体西用”不过是“牛体马用”，不伦不类。他们把目光集中在西方的社会制度上，他们认为只要把西方社会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中国就会摆脱面对的苦难，梁启超说：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症）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①

维新派的救国方案，由洋务派的“实业”救国转到“法制”救国，与洋务派相比，它由物质文化层面转向了制度文化层面。然而衰老的肌体是扼杀新细胞的病灶，维新派“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维新运动最后在袁世凯的背叛与慈禧太后的高压下，以“戊戌六君子”的头颅，画上了一个鲜红的句号。在我们为这场历史壮剧的惨败扼腕叹息时，似乎也不难想象到，即使没有慈禧的高压与袁贼的背叛，戊戌变法能否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日薄西山的封建政体，没有西方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任何思想基础，而地方官吏各自为政、腐败糜烂、目无法纪、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饮冰室合集》第1卷，“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2页。